

刘少奇敌后办学记

□ 刘 静

从1940年到1942年，刘少奇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物资极度匮乏、教学场地极其简陋、工作任务异常繁重的情况下，仍旧想尽一切办法，创建了抗大分校和华中局党校等，并亲自为学员上课。刘少奇在领导党员教育工作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关于党员教育的重要思想理论，为党的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和科学的实践依据。

创建抗大第五分校并兼任政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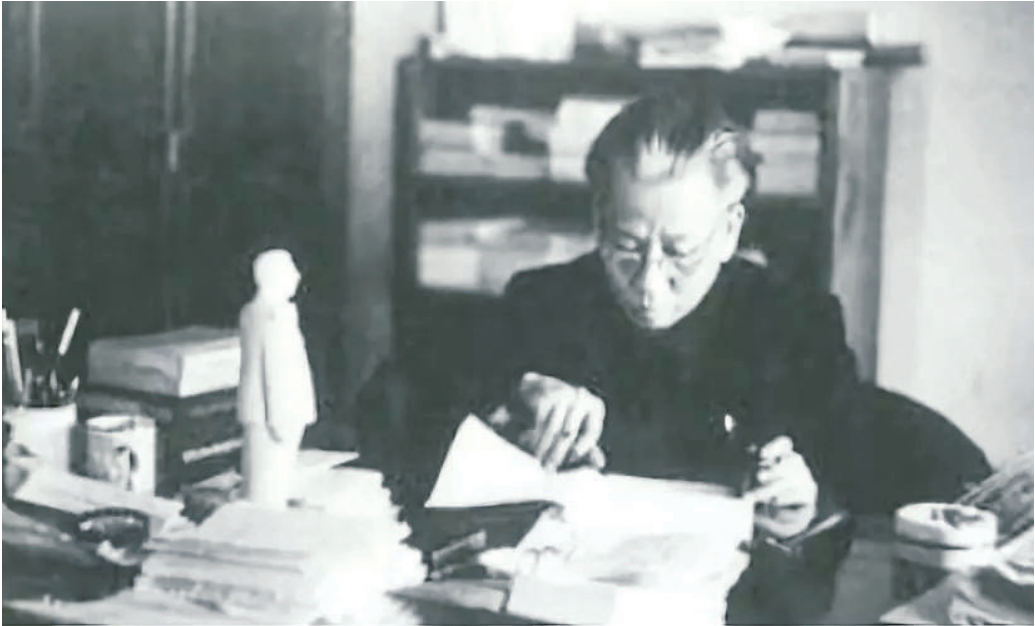
1940年2月20日，刘少奇向中央建议，在华中应立即成立抗日军政大学分校或新四军干部学校，吸收投奔新四军的大批青年学生。11月，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后，在刘少奇的指导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干部学校、新四军皖东干部学校等，在盐城合并组建抗大第五分校，校址设在海陆中学，刘少奇兼任政委，陈毅兼任校长，张云逸任副校长，谢祥钧任教育长。分校编为5个大队和1个机炮连，全校干工、学员共3000多人。组建当日，在海陆中学大操场上举行了分校成立大会和第一期开学典礼，刘少奇出席了大会并讲话。他说：“抗日军政大学是为部队培养骨干的，你们都是各部队选送的优秀干部和老战士，毕业后就是一名大学生了，就是部队的基层领导和骨干了，你们学习很重要，任务也是很艰巨的。希望大家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尽快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军事技术水平，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英勇奋斗！”

五个大队的学习重点各有不同，一、二大队为军事队，三大队为政治队，四、五大队是为部队培养文化、宣传、文艺骨干。刘少奇在抗大五分校分别为学员作了三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并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印成小册子发给党小组，星期六党日活动时组织党员学习讨论。星期六早上，大队一般都要进行会操，刘少奇经常参加，有时还亲自进行讲评。

抗大的生活异常艰苦，刘少奇和学员过着一样的生活，穿一件深灰色的旧棉布短大衣，经常同陈毅等来到学生宿舍嘘寒问暖，促膝谈心。皖南事变后，盐城一度作为新四军的军部和抗大第五分校所在地，曾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和封锁，这给抗大学员的学习和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了躲开敌人飞机的袭击，校部干脆给每人发一张小板凳，白天跑到城外的乱坟堆里上课。当时刘少奇给学员讲授党的性质和任务，数九严寒，刘少奇衣着单薄，站在刺骨的寒风中讲课，语调坚定有力、神态镇定自若，使学员们很受感动和鼓舞。

皖南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早晨，刘少奇来到操场向抗大学员宣告这个消息。他说：“敌人可能要进攻和破坏我们的学习，我们就更要意志坚定，抓紧时间刻苦学习，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这坚强有力的话语，让学员精神振奋。

1941年1月11日，北风怒吼，寒冷异常。日军突然出动了15架飞机，对盐城进行狂轰滥炸，抗大宿舍被炸成了一堆瓦砾。当天晚上，校部召开紧急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政治动员。他气愤地说：“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制造



皖南事变，打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帮了鬼子的忙。盐城是新四军最高领导机关所在地，将成为敌人的主要袭击目标。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有自我牺牲精神，立足于打；另一方面，又要争取和平、争取团结、一致对外。”会场上群情激愤、热血沸腾，刘少奇挥着右手，冷静而沉着地说：“你们有顽强的革命斗志和英勇杀敌的精神，这是很可贵的。但干革命要讲究战略和策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2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革命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要依靠三大法宝，这就是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这三个法宝缺一个也不行。”接着，刘少奇对三大法宝的意义和重要性作了详细的、深入浅出的讲解，使师生们受到很大的教育。

抗大五分校训练和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军事、政治干部，适应了抗日武装不断发展的需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创建华中局党校并兼任校长

皖南事变后，针对蒋介石顽固派的罪恶阴谋，党中央采取了针锋相对、坚决反击的方针，一方面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另一方面重建新四军军部，新四军各部队也进行了整编。

1941年4月下旬，刘少奇提议在盐城创办华中局党校，着重培训华中部队团以上和地方县以上的干部，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刘少奇亲自兼任校长，彭康兼任副校长，温仰春任教育长。党校设两个队，第一队的学员为团、县以上干部，第二队的学员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刘少奇明确指示，党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根据这个办学方针，党校设置的主要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刘少奇常到党校授课，主要讲授党史、形势、战略策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

随着党内思想斗争的发展，特别是总结皖南事变经验教训中，有些地区和部门产生了一些偏向。1941年7月2日至3日，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连续作了两天讲演，全面总结党内斗争

的历史经验，阐述进行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和方法。他明确地提出党内斗争的性质“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他指出党内思想斗争应该适当开展的原则，并深有感触地说：“同志们首先要了解，党内斗争是一件最严重最负责的事，绝不可以草率从事，我们必须以最严肃最负责的态度来进行……”这篇演讲稿传到延安后，在《解放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亲自写了编者按，指出：“这是刘少奇同志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在华中局党校的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现当整风学习开展与深入的期间，特为发表，望全党同志注意研读。”

7月，日军向盐城地区发动大规模“扫荡”后，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在同日军“兜圈子”中转移到阜宁县。华中局党校也随着迁到阜宁县西南的偏僻水乡汪朱集。10月，第二期培训班开学，这期学员仍是军队团以上干部和地方县以上干部，共200多人。

为了有更多的时间了解学员的思想和学习状况，刘少奇索性搬到党校，和学员在群众家里同吃同住，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刘少奇经常通宵达旦地备课，虽然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但仍坚持讲课。刘少奇没有其他个人爱好，只保持着每天上午下午在街上散步的习惯，其余时间都在紧张地工作。

在这一个月中，刘少奇先后讲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战争和战略问题》《人为什么犯错误》《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等近20个题目。

他的报告深受学员和干部的欢迎，不仅党校学员听，华中局机关和新四军的干部也都去听。那时的党校，没有课堂，没有礼堂，更没有扩音设备。刘少奇授课时，新搭成的大草棚里坐满了学员，各地来的负责同志只能坐在草棚外边场子上，场子上也坐得满满的。这些报告对普遍提高华中各级干部的 leadership 水平，促进各抗日根据地的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自2018年第1期《世纪风采》）

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次知识青年从军潮

□ 赵占豪

1939年6月至12月，我党连续下发3个接收知识分子参军的重要文件。其中，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号召放手吸收青年来延安学习。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等院校基础上，我党又陆续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办了14所抗大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属中学，共培养了10多万名军政人才。

为贯彻中央指示，抗大的招生广告从延安到西安的每根电线杆上都贴有一张。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也设立专门招生点，广泛进行招生宣传。据当时的学生回忆：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的徐特立经常给青年作演讲，号召青年到延安去，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说可以保送进抗大或延安公学，许多同学当场报了名。

除了延安，晋察冀根据地因为靠近京津，吸引了两地许多高校以及东北的流亡学生前往投奔，一时以人才荟萃而著称。苏沪等地的青年学生则大量奔赴江南新四军的驻地。

大量青年奔赴抗日根据地，引起了国民党的高度警觉，他们软硬兼施、千方百计进行封锁阻挠，很多人被国民党宪兵特务扣留关押，甚至惨遭杀害。尽管如此，到1942年底，共有10万多以进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抗日志士，投奔到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

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最高学府

□ 刘艳慧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培养和训练军事政治干部的高等学府，前身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毛泽东为其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

抗大学员以从部队抽调干部为主，并招收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全校学员最多时达1万余人。学习内容有关马列主义基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运工作、游击战、中国历史等，学员边学习，边战斗，边生产。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

云等人都曾到抗大讲课或作报告。

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抗大于1937年7月开始，先后迁至山西省武乡县蟠龙镇以及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办学，1943年春迁回陕北绥德。1939年春至1945年春，还陆续在晋冀鲁豫、晋察冀、山东、华中、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建立了14所抗大分校。

在抗日战争期间，抗大总校连续办了8期，连同各分校共培养了10万余名军事、政治干部，对于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校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建设和部队建设的优良传统。

（摘自2015年第3期《军事历史》，原标题为《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最高学府——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交通大学1896年以南洋公学之名创建于上海，1921年命名交通大学后声誉尤著，是钱学森、张光斗等一大批杰出科学家读书与成长的摇篮。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学校亦曾走出黄炎培、邹韬奋这样的为数众多、影响深远的时代巨子。

1955年上半年，中央作出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重大决定。1956年8月10日本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但对交通大学来说，却注定要载入史册。随着喧天的锣鼓声，第一批上千名交大教职工、家属和学生身负行李，冒着酷暑，心情激动地会集在徐家汇车站，在上海人民群众热烈而依依不舍的欢送中登上开往西安的专列，历经数年的大规模迁校由此掀起高潮。

交大迁校处于一个鼎新革故翻天覆地的时期。西迁师生员工的车票上，有一行字特别引人注目：“向科学进军，支援大西北！”它鲜明地揭示了西迁创业的主题。交通大学的西迁，不是交大一所学校的内部事务，而是国家的重大抉择，具有长远战略意义。

交大校长兼党委书记彭康等的全校师生员工，把国家民族的要求与学校命运、个人发展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接到中央指示的当天，迁校工作就已经开始部署。一个月后，西安新校选址即告完成，半年后全面展开施工，一年后新校舍就已经可以接纳师生员工了。1956年9月10日，交通大学在古城西安，借用当时最豪华的人民大厦举行了开学典礼。此时到达新校园的师生员工和家属已有6000余人，而后续人员还在不断抵达，从上海每天有约150吨物资运抵西安。

彭康是交通大学西迁的核心人物。他准确领会中央精神，坚决果断，行动迅速，既大力加强组织宣传工作，又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

交通大学西迁记

□ 贾简鸣

性，不但出色地领导了整个西迁工作，更把自己的全部心血乃至生命献给了西迁后的交大事业。时任副校长的陈石英，1917年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即执交大教鞭，是德高望重的学校元老。他不顾65岁高龄，毅然出任迁校委员会主任，前后数年奔波操劳，付出艰辛努力。苏庄原在高等教育部任副司长，迁校前夕调任交大副校长，一到校就在彭康领导下，具体组织开展迁校工作，1956年8月10日开往西安的专列即由他带队。

人们用“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来概括交通大学西迁精神。这16个字镌刻在西行的逶迤征途上，是老一辈交大人用一腔热血写成的。

人们看到，始终走在交通大学西迁最前列的，正是那些声望高、影响大的老教授。钟兆琳教授从跟随彭康校长踏勘新校址那天起，就认定了西迁这条路，他对开发建设大西北极为热忱。妻子卧病在床，他就一个人来西安，天天吃集体食堂，在一片空地上建起电机实验室。动力机械系主任朱麟五，副主任张景贤、陈学俊，齐心协力忘我工作，发挥学术带头人作用，为交大搬来最完整的一个系。各专业知识的主要带头人几十位教授，成为西迁的中坚

力量。不少人去往西安前都不约而同做了一件事：廉价处理掉在上海的住房和资产，义无反顾，慷慨西行。

人们看到，交大年轻教工和学生热情极为高涨，赋予迁校建校强大的青春活力。青年人是教师队伍中最活跃的部分，他们打起背包就出发，很快成为西安交大教学科研中的一支骨干力量。西迁列车上，大学生们唱得最多的一首歌就是那首《我们要和时间赛跑》，期盼早日抵达目的地，早日学成本领报效国家。1956年毕业的大批高中毕业生，正是由于交通大学迁往西安而纷纷报考这所学校，他们拿到录取通知书后直接在西安报到，投入开发建设大西北的火热生活中。

人们不无惊讶地看到，一所庞大的60年老校路途迢迢地向西行进，竟是那样的有条不紊、快捷有序、精确到位。在抵达新校园时，图书资料、机器设备件完好无损，教学用品全部在学生到达前搬运就绪。每个家庭的所有物品，都精心打包，安全运出，而当师生下了火车走进西安新家，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摆放到位，打开就能用了。这一过程其实并不简单，其中不知融入多少人的心血和汗水！

人们同时还看到，党中央开展大量工作，

确保交大成功西迁。西迁也得到了西安、上海两地强有力的支持。上海先后调动了大量车皮，安排一趟趟专列运送西迁师生和物资。上海还动员服务业职工随校西迁，从点点滴滴入手，解决师生员工生活上的难题。

为解决好迁校问题，根据当时西安、上海两地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高教部在充分征求学校意见后，在1957年8月4日呈报周恩来的文件中提出：“交通大学分设西安、上海两地，两部分为一个系统，统一领导。两部分根据西北及上海地区的需要，各担负不同的任务。西安部分的任务为：完整地设置机、电方面的主要专业，逐步添设新技术和理科方面专业，并发展成为理工大学；上海部分的任务为：办好机、电各专业，着重提高教学质量。”对此周恩来批示：“请即明令公布，以利进行。”

原本就蕴积在师生员工中的积极性再次喷发，迁校工作又大步向前推进。到1958年暑期，交通大学主力西移。在交通大学分设西安、上海两地，由彭康校长实施统一领导两年之后，根据新的发展实际，1959年7月，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西安、上海两个部分各自独立成校，分别成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成为当时全国16所重点大学中的两所。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彭康，由中央任命为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肩负无比光荣的使命，脚下的路却极为艰辛。草创时期的西安交大校园生气勃勃，但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下课去食堂要翻一条大沟，开会要坐在四面透风的草棚大礼堂里，冬天的大教室要靠一个小炉子勉强取暖。现在10分钟轻松走到的路程，当时竟要绕一个小时才能抵达。校园野草丛中兔子乱跑，入夜有狼叫。但与此同时，一栋栋巍峨的大楼拔地而起，一项项基础设施逐渐完善，一个区域巧妙设计、分布合理、气势恢宏的现代化校园拂去面纱，展现在人们面前。在大西北和中西部工业方兴未艾强劲发展的态势下，学校机、电、动专业传统优势得到全面发挥，同时工程力学系、工程物理系、无线电系和一批反映当时最新科技发展的新专业相继建成，前所未有的拓展了学校事业，使她成为祖国西部一颗璀璨的明珠。

西安交大秉承“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育人传统，坚持立德树人，杰出和优秀人才不断涌现，西迁后为国家培养大学生数十万名。

（摘自2016年第4期《博览群书》，原标题为《交通大学的西迁壮歌——西安交大与中国发展“一盘棋”》）

